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SINCE 1949

1949 年以來 中國在西方的形象

〔澳〕馬克林 (Colin Patrick Mackerras) · 著
張勇先、吳迪 · 譯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澳〕 馬克林 (Colin Patrick Mackerras)

目錄

第1章 序言

形象來源與理論構建	14
文獻綜述：本書與眾不同之處	16
研究方法	18
媒體的發展	19
幾個相關要點	20
小結	21

第2章 歷史背景

18 世紀	26
19 世紀	27
20 世紀上半期	31
美國的中國形象 / 美國之外的中國西方形象	
小結	40

第3章 中國政治與外交關係的形象 (1949—1971/1972)

背景環境	44
形象構建	46
1949—1966 年的中國形象	50
“一個專制的政權” / 蘇聯的控制 / “好鬥中國” / 個人經歷與印象	
“文化大革命”和西方形象	63
部分主流形象	
小結	65

第 4 章 中國政治與外交關係的形象 (1971/1972 — 2001)

背景環境.....	71
中國形象的兩次轉變	74
關鍵因素.....	77
鄧小平的領導和形象 / 人權問題 / 政府機構 / “中國威脅論” ?	
個人經歷與印象.....	88
小結.....	92

第 5 章 21 世紀中國的政治和整體西方形象

背景環境.....	99
形象的構建	101
中國的崛起	104
中國作為潛在威脅.....	105
與“中國威脅論”相關的具體事宜 / 關於中國不斷提升的影響力和 “中國威脅論”的部分民意調查 / 中國與非洲的關係	
民主與人權	115
人權	
2008 年北京奧運會	119
奧運會的籌備階段 / 奧運會本身	
對未來的預期	123
近期圖景 / 遠期圖景	
小結.....	129

第 6 章 20 世紀末中國經濟、人口政策以及環境問題的形象

毛澤東時期的中國經濟	137
人口問題 / 環境問題	
20 世紀 80 年代和 90 年代.....	145

中國人口政策和形象 / 改革政策對環境的影響	
個人感受.....	157
小結.....	163
第 7 章 21 世紀中國經濟、人口政策以及環境問題的形象	
西方對於中國經濟增長的看法.....	169
中國經濟增長對外部世界有何意義？.....	173
兩個相關形象 / 澳大利亞視角 / 參與非洲與巴西事務	
環境與人口.....	183
哥本哈根 2009 / 廣義上的環境 / 人口	
小結.....	189
第 8 章 中國的社會文化形象	
20 世紀 70 年代末以前的社會文化形象.....	197
家庭與婦女，以及一些個人印象 / 宗教，以及一些個人印象	
改革開放時期.....	204
軟實力 / 家庭與婦女 / 關於家庭和婦女的個人印象 / 宗教和傳統思想 / 互聯網的形象 / 電影的形象	
小結.....	220
第 9 章 結語	
中國西方形象背後的因素.....	227
如何改善形象？.....	232
簡明大事年表.....	236
參考文獻.....	240

第1章

序言



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馬可·李羅都是一位傳奇性的人物。他來自於一個偉大的文明，試圖去接近和了解另一個同樣偉大的文明，並將他在那裡的神奇經歷與所見所聞描述給自己故鄉的人們。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是第一位詳盡描繪中國的西方人，因此，在中國的西方形象這個論題上，他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緣於這些成就，他值得我們尊敬與敬仰。在眾多的作者中，他是第一位將中國引入西方哲學思考的人。在歷史的長河裡，中國這個偉大的東亞國家時而被西方視為典範，時而卻成為一個負面的例子；她的重要性時而在西方的想像中無限膨脹，時而卻一落千丈。

本書聚焦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即1949年以來的中國在西方的形象，致力於描繪和分析這些形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並將它們置於相應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下進行考量。本書的目的是探討哪些人或是哪一群人樹立了中國的形象，以及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如何做到的。它採用了時間順序和話題分類的方法，涵蓋了政治、經濟、社會形象，以及和外交事務相關的形象。

眾所周知，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意義的話題，因為它涉及跨文化關係以及人們是如何彼此看待的。在西方，長久以來都有這樣一種傾向，將中國和其他文明定位成“異國情調”。這不僅意味著西方人對於神秘事物的欣賞態度，同時也或多或少地蘊涵著批判甚至是輕視的意味。今天，這種傾向也許有所減弱，但它卻遠遠沒有消失。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所採取的政策往往會影響它對對方的看法，反之亦然。也就是說，形象，或者更確切地說心理上構建出的對他者的形象，也會影響政策。

這也為中國的西方形象的重要性增加了砝碼，原因很簡單：這兩個重要文明之間的觀感和互動關乎整個世界。

那麼，本書的論題“中國在西方的形象”具體是甚麼呢？我將形象定義為足以衝擊觀察者意識的重要認知。通常，它們都被以一些易於被接觸到的方式記錄下來。例如，和一位西方人士關於中國的偶然談話可能就是一個形象，而作為談話的親歷者，我認為我有資格將它囊括進本書，當然還包括我以其他方式接觸到的關於中國的對話。形象同時還包括圖片，本書中也包含一些圖片，它們大部分是由我本人和一位朋友拍攝的。

這是一個宏大的話題，我們不可能涉及所有的形象。本書所包含的形象幾乎都是關於人或與人有關的。其他方面的形象，例如中國的風光



長城以及周邊山脈，拍攝於1964年10月。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長城，此行的同伴之一為著名的英語學者陳琳教授，他至今依然居住在北京，距中國人民大學不遠。

景色、生物物種、野生動物，儘管也具有重要性和趣味性，但因與上面所提及的範圍無關，故在本書中並未涵蓋。

形象來源與理論構建

如上文所述，中國的形象是西方文化傳統的一部分。這就意味著，西方如何看待中國不僅取決於中國本身的實際情況，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賴於西方的學術文化或意識形態氛圍。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複雜的問題：到底是甚麼引導著一位觀察家或一組觀察家建立了關於中國的形象呢？關於這個問題，一項早先的研究認為這與個體的個性有關：“我們對於中國（或其他任何文明）的反應，一部分是由那裡的客觀現實決定，一部分則是由我們個性中有意識的利益和潛意識的需求決定的。”^①對於所有的觀察家來說，每一個人，無論他有著怎樣的文化背景、成長經歷、思想形態、脾氣秉性、看法偏見，他也許都沒有意識到是甚麼形成了他的觀點，但卻無一例外地受到了影響。

在個體之上更深一個層面來探討影響形象形成的因素，例如職業、階級、社會乃至民族，則更為複雜。對於個體和族群的心理學研究已經遠遠超出了本書的範疇，然而一些關於殖民主義和權力關係的理論，儘管已經不像在 19 世紀後半葉和 20 世紀前半葉時那麼重要，但在本人看來，依然可以用來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西方的形象。

法國歷史學家、哲學家米歇爾·福柯（1926—1984）曾就權力和知識的關係提出了非常精妙的觀點，他關於權力 / 知識密不可分的見解以

及“真理制度”的理論影響甚為廣泛。他總結說：“真理與權力制度以一種循環流通的方式相互關聯，權力制度產生並維繫著真理，而真理引發並擴展權力的效力。”^②

在這個相對繁複的論點中蘊涵著幾點含義：真理很少存在於真空狀態，而是存在於社會現實之中，其真實與否，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取決於權力制度，包括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領域的權力體系，而這些權力體系所產生的真理又反過來維繫著現存的權力關係。福柯特別指出，社會的“真理制度”決定著“那些制定真理標準的人的身份地位”^③，而這些人反過來又致力於維繫權力關係。將這個理論運用於研究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也就意味著西方社會內部以及中西雙方之間的權力關係影響著西方人對於中國的認知。

另外一個探討權力與真理關係的理論是“東方主義”，它由著名的巴勒斯坦裔美國學者、文學理論家愛德華·W·薩義德（1935—2003）提出，薩義德在後殖民主義理論上的貢獻也是令人矚目的。儘管薩義德最為關注的是西方對於巴勒斯坦問題和伊斯蘭教的學術態度，但是他的理論也適用於研究中國在西方的形象。“東方主義”的核心觀點是，西方學者對“他者”文明進行定義和構建，其目的在於彰顯自我的理性、權力和價值，並以此實現強權政治，強調自我主體的優越地位並期望能保持下去。西方關於亞洲的過去和現在的論著傾向於將西方作為摹本，而使得亞洲被邊緣化，被打上了“奇特”或“不可理喻”的標記。^④

我非常認同這兩種理論，要避免偏見是非常困難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支持這些理論並不意味著我認為創建中國形象的作者們沒有盡職盡責

地完成他們的工作，相反，我相信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都竭力地想要真實呈現他們的所見所聞。有時候，政治體制會直接左右觀點，但在我看來，相較於這種公然的強加，福柯的真理制度和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所論及的桎梏則更為隱晦和模糊。換言之，儘管在西方，思想自由和表達自由的權力是真實有效的，我卻認為自由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我們無法認定一個個體或一個社會是絕對自由的，而另一個則是絕對被禁錮的。福柯和薩義德的理論都表明，對自由的束縛遠遠要比我們表面上看起來的更多，即使是對於那些自認為完全自由的人。

因此，形象並不像它們看起來那樣直截了當。它們當然涵蓋事實，但同時也涉及許多其他因素。它們是觀察者的經歷、思想和偏見的外化，反映著社會內部和國際社會之間的權力關係、權力體系，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

文獻綜述：本書與眾不同之處

關於中國在西方的形象，以前的文獻早有論述。它們主要是將中國漫長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來敘述，而較少著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是當代中國的形象。早期的研究之一即為前文引述的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的研究成果。在《中國變色龍：對於歐洲中國文明觀的分析》（*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一書中，他提出，中國猶如變色龍一般不斷變化自己的“顏色”。道森是“鐘擺”理論的支持者，這種

理論認為中國的西方形象不斷地由一邊轉向另一邊，由積極到消極，由消極再到積極，周而復始，往返反覆。在本書中，我並沒有將這種理論囊括進我的理論體系，因為它只是對於形象的一種觀察而不是一種解釋，它僅僅關注了由一面向另一面的轉變卻並沒有試圖去探究這種轉變背後的起因和原動力。在最近的出版物中，也許最為出名和最具有影響力的是《大漢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1998）。書的作者，傑出的英裔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曾說過，他的這部作品主要聚焦於關於中國的小說作品，並“引領我們從12世紀來到了20世紀”。一位重要的評論家曾指出，這本書開啟了一種漸進的轉變，即將焦點“從特定的歷史事件是否真實發生了轉移到一個更為集中的問題上，即價值評價是如何與關於中國的經驗和思考聯繫起來的”^⑤。換言之，它將中國的實際情況與關於這個國家的形象和評判區分開來了。我本人曾出版過題為“西方的中國形象”一書，書中涵蓋了從最早期到書籍出版前的關於中國的一系列形象。第一版於1989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修訂版在1999年6月出版。^⑥

本書與以往文獻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主要著墨於1949年以後的中國，主要是關於中國大陸，而並不包括台灣、香港和澳門地區。當然，我絕不是否認這些地區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由於在這本書所論及的時間跨度中，香港和澳門地區很長一段時間處於殖民統治，而中國大陸和台灣地區分別有著鮮明而各具特色的政治制度，因而港、澳、台地區和中國大陸在西方社會中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

研究方法

本書的研究方法呈現出三重架構。最關鍵的一種方法在於選取 1949 年以後中國在西方世界中最為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形象。我主要是依據相關作者、書籍、文章、報紙和雜誌的影響力來選擇的。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我對於一些形象的選擇基於我對於它們是否具有代表性的判斷，以及這些形象是以印刷文字、圖片影像還是口頭表述的方式呈現的。

第二種方法是借鑒他人所進行的調查研究。我本人並沒有嘗試或進行過這樣的調查研究，主要是因為本人在這個領域的技能有所欠缺，因而沒有意願也認為沒有必要對前人業已完善的專業領域再做出補充。

第三種方法是對我本人的經驗和印象在某種程度上的總結。我在 1964 年首次到訪中國，作為一名教師在當時的北京外國語學院（現更名



北京外國語學院（現北京外國語大學）的西院大門。此後這座大門不斷被修繕升級。圖中右側的建築原為英語系辦公地點，我和妻子在 1964 年至 1966 年曾在此工作。今天這座建築為德語系辦公地點所在，儘管內部已被升級改造，但外部面貌變化不大。照片拍攝於 1965 年。

為北京外國語大學）任教兩年。從 1964 年至今，在我對中國多達 60 餘次的訪問中，我見證了這個國家天翻地覆的改變。在過去的這半個世紀裡，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外國，我和諸多的西方人曾就中國的印象進行過探討，並會在此書中引用其中的一部分。但是，本書中並沒有採納正式訪談這種研究方法，無論是針對個人的還是群體的。

媒體的發展

呈現和展示形象的媒體自 1949 年以來經歷了傳承和改變。許多媒體形式在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便已存在。有些報紙，如《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自 1851 年以來發行至今。《時代週刊》（*Time*），作為亨利·路思義（Henry Robinson Luce, 1898—1967）媒體王國旗下最為重要的出版物，目前在全球擁有著 2500 萬的讀者，自 1923 年創刊至今一直保持著極高的影響力，當之無愧是西方社會中最具有代表性和最具有形象塑造力的週刊。紙質書籍作為傳播媒介已有幾百年的歷史了，儘管有學派認為，從長遠來看它最終將被電子書籍取代，然而它至今仍然是大眾傳媒的一種主流形式。廣播的歷史並不如書籍長遠，但它也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就已誕生。

相較而言，其他的媒體形式的歷史則較短。在 1949 年，電視仍然是一種全新的媒體形式，且尚未擁有大批的觀眾。但當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在 1972 年 2 月訪華時，電視已在重塑中國形象，在將其扭負為正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到了 21 世紀，最具有代表性的媒體形式當屬互聯網。這種形式直至 20 世紀 90 年代才成為大眾傳媒的一個重要分支。但自此之後，它在世界的溝通交流中發揮了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並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推進了全球化的發展進程。它的存在使得地球兩端的人們實現了即時溝通，儘管這一可能在電話時代便已實現，但互聯網在圖像呈現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互聯網上，人們可以瀏覽報紙文章和電視節目，這就意味著其他形式的媒體正在失去它們專屬的影響力。特別值得關注的一點是：互聯網對於每一個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是開放的，你並不需要是一名專業記者或是專業作者就可以在互聯網上發表你的觀點。那些普通讀者觀眾對於報紙雜誌和電視節目的評論及其所反映出來的觀點態度，在 21 世紀之前幾乎是不可能接觸到的。

幾個相關要點

關於中國在西方形象的形成機制還有幾個要點。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也許就是自 1949 年以來，世界的主導力量一直是美國。美國在新聞、出版、電視、廣播和互聯網等媒體上擁有著其他西方國家難以匹敵的影響力。當然，本書中也會涵蓋其他西方諸國，並呈現一些非美國化的中國西方形象，但對於中國的形象，西方諸國也是各持己見，觀點各異，這就使得我們可以從不同國家的角度來探究中國的西方形象。事實上，它們曾經並且依舊會向我們展現多元化的觀點。^⑦不過在各國對於中國的觀感中，相同之處遠勝相異之處，因此，在論及中國的西方形象時，

既要考慮到西方諸國的觀點，更應主要依據美國所塑造的中國形象。

無論是關於何種話題還是在任何時段，我認為我們都可以選取一個主導的形象。需要強調的是，與此同時一定還有其他的形象存在。即使是在中國的形象跌入谷底的時候，也有人持有和記錄著中國的正面形象。不同的個體記錄和書寫著不同的觀點，一些觀察家，即使是對中國持有極端正面態度的那些，也會提出批判性的意見。在任何時候或任何地點都不可能存在絕對單一的形象。在這個話題上，我們應持以審慎的態度去分析趨勢和傾向，而不是尋求絕對和唯一。

小結

過去的幾十年中，在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方形象的研究中，我得出了兩個結論：

第一個結論即中國的西方形象並不代表著“事實”或是這個國家的真實情況。“事實”是一個非常難以定義的概念，已經超出了本書的範疇。在任何一個特定的情況中，都有著直觀可感的現實，但它們卻是變幻無窮的，特別是在一個如中國這般廣袤多姿的國家裡，任何人都不能宣稱掌握了其中的要義。中國的西方形象是由一系列複雜的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展現的不僅僅是西方對於中國的態度，也是西方各國本身。

第二個結論是，中國的整體局勢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有了長足的發展，而其在西方的形象卻改變不大。我深知，這是一個非常籠統的概括，而我並不比別人對中國的現狀有著更好的了解，但是，在自 1964

年至今對中國的多次造訪中，我親眼見證了這個國家巨大的，甚或說是天翻地覆的改變。這些變化在我看來，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無論是從整體上還是在某個特定領域，我們都不難指出那些變壞了的方面，但是，從個人長期的經驗來看，相較於我第一次造訪中國時，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整體生活圖景已經變得更加自由、繁榮、自信和多元。整體形勢與過去相比可謂是天壤之別。

當然，中國的西方形象也是有所改善的，然而據我所觀察到的事實來看，這種改善卻極其有限。至今仍然有這樣一種觀點，認為對中國持有正面的態度就是天真無知。極端的負面評論家們和他們的批評依然和過去一樣普遍。正面的評價，雖比過去較為常見，但相較於批評，讚揚總是以一種更為溫和的方式呈現。這種現象某種程度上是由西方媒體和學界的性質決定的。在西方，他們認為自己的部分職責就在於評判當局、審視社會，因此他們更傾向於批評而不是頌揚。但對於西方觀察家們來說，他們需要關注的應當是中國人民正在為之奮鬥的國家願景，而不是他們為自己設定的職責目標。

註釋：

- ① Raymond Dawson,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67), p. 2.
- ②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The Harvester Press, Brighton, 1980), p. 133.
- ③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p. 131.
- ④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Random House, Vintage Books, New York, 1978; 1979), pp. 38-41.

- ⑤ Jamie Morgan, “Distinguishing Truth, Knowledge, and Belief: A Philosoph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Problem of Images of China”, *Modern China,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0, no. 3 (July 2004), p. 407.
- ⑥ 曾有一篇具有高度哲學思辨性的著作對聚焦這一話題的三本著作做出過評述，這三本著作分別是 Christopher Jespersen,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1931-1949*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ford, 1996), Jonathan D. Spence, *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orton, New York, 1998) and Mackerras, *Western Images of China*。除這三部作品以外，摩根還提到了許多其他與中國的西方形象有關的作品。
- ⑦ 有關觀點的多元化，以澳大利亞為例，在澳大利亞，有多本書籍和多篇文章論及澳大利亞和澳大利亞人是如何看待中國的，例如，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6)。

第2章

歷史背景



簡單地回顧一下中國西方形象的歷史背景有助於我們在一個較為宏觀的框架下來對這個問題進行考量。前文已有論述的部分^①，在此便不再贅述，而只是囊括 18 世紀以後的時期，尤其是 20 世紀上半期。我認為這一時期中國的形象呈現出的是兩個極端的反覆，可以被描述為搖擺不定。但是，我並不傾向於在此引入“鐘擺”理論，因為這種擺動的幅度不均，且持續的時間也不同。

18世紀

作為天主教的牧師，耶穌會士締造了西方漢學的第一個偉大時代。這個時代的巔峰在杜赫德（Jean-Baptiste du Halde, 1674—1743）的作品《中華帝國全誌》（全四卷）中得以呈現。這部著作的法文版在 1736 年出版，英文譯本隨後在 1741 年出版（書名為《中國通史》）。儘管杜赫德終其一生未曾到過中國，卻在與耶穌會士的接觸中得以涉獵大量相關資料，並對百多年歐洲傳教士有關中國之調查報告和來往書信進行了研讀。

杜赫德對中國推崇備至，他聲稱中國較之歐洲諸國更為先進。首先，他極力稱讚中國政府。他認為中國人民仁愛善良、智慧勇敢，並認同中國“天朝上國，君臨天下”的自我標榜。他將中國看作一個環境優美、物產富饒、農業發達、交通便利的繁榮大國。他讚揚中國是禮儀之邦，中國人民愛好和平，並盛讚中國女性端莊正直，品德高尚。他提到中國的“裹腳”習俗並為之辯護。他承認這對外國人而言是“難以接受”的，但宣稱中國婦女不僅“樂於接受這種不便，且將之提升，力圖使自

己的腳盡可能的小，認為這有一種獨特的魅力”^②。

杜赫德的作品在當時受眾廣泛，並對 18 世紀的思想家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是在啟蒙運動時期。這一時期最為重要的人物，尤其是在樹立中國形象方面，當屬伏爾泰。在伏爾泰的作品中，關於中國的言論俯拾皆是，且多為讚美和頌揚。在他看來，中國的政府組織是一個優良的模板，而乾隆皇帝則是代表了他哲學王理想的光輝典範。中國的政治體系中最為伏爾泰所稱道的就是政府的世俗性，即教士無權干政。他服膺孔子，稱讚後者是一位道德哲學家，不做神啟者，也不為先知；儒家學說也是一個哲學體系而非宗教體系。伏爾泰對於中國正面形象的塑造具有極大的影響力，直至今日，“世俗政府”仍然是現代社會的一個標誌。

像杜赫德一樣，伏爾泰也從未親自遊歷過中國。而早在 1743 年，由喬治·安森男爵所率領的英國船隻就抵達了廣州。不過安森男爵關於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的評論則與上述二人大相逕庭。他認為中國政府腐敗強權，而人民都是說謊的小偷。顯然，他們絕不可能是西方的典範。安森男爵的遠航激發了英國人對於航海和冒險的熱情，也使得他的經歷在塑造形象方面影響廣泛，包括關於中國的形象。

19世紀

安森觀點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了 19 世紀。在這一時期，西歐各國和美國經歷了工業革命，它們的自信心不斷膨脹。與之同時滋生的還有它們統治世界的野心，這就導致了殖民主義的開端。自 1842 年英國與中

國簽訂《南京條約》開始，西方列強相繼強迫沒落中的中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西力量對比劇烈轉換的結果就是西方超越了中國並凌駕其上。這對中國形象的影響顯而易見：西方蔑視中國，認為它故步自封、腐朽獨裁，這也就意味著無論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人民的形象都跌入了谷底。

如果說在 18 世紀，在中國的西方形象這一領域是由法國執牛耳的話，那麼在 19 世紀則轉由英國主導，美國以一位主要參與者的身份出現，法國依然保持著重要的地位。傳教士、外交官、探險家們是這一時期主要的形象塑造者。報紙、百科全書開始擁有廣泛的受眾，儘管只是針對那些有文化修養的人群。

隨後在 1858 年（《天津條約》）和 1860 年（《北京條約》）簽訂的條約首次允許外交官常駐北京，並給予了外國人諸多特權，如在中國境內自由傳教和自由行動。在此之前，外交官只能因特定原因前往北京，且在使命完成後必須離開，所有外國人在中國的行動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在新的規定下，外交官們可以依據本國的需要在北京駐留，商人、傳教士和冒險家們則可以在中國自由行動。

這些群體很快就充分利用了他們新的自由。19 世紀的傳教士，相較於他們耶穌會的前輩們來說，容忍度總體較差。新教徒人數眾多，而天主教也依然活躍。從形象的角度來看，尤為重要的一點是，19 世紀的傳教士去中國不僅僅是為了使人們皈依上帝，而且還要譴責那些不信仰上帝的異教徒。因此，他們所描繪的形象表現的是基督教的優越感和屈尊就卑之情。

在 19 世紀，西方關於中國的集成之作中最廣為人知的也許就是《中國總論》。這本書具有極高的影響力和形象塑造力。作者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是美國當時來華的外交官和傳教士，《中國總論》的出版為其贏得了不小的學術聲譽，耶魯大學後聘請其為教授。衛三畏習得漢語，且認為對中文的掌握有助於提升西方在中國的形像，也有利於傳教士宣揚基督教。

用衛三畏自己的話來說，他試圖做到對中國公允。當時，西方人將中國的社會制度與基督教體制相比，並對中華文明抱持著某種奇特而無名的可笑印象。在這樣的時代風氣中，衛三畏認為他的作品能糾正其國人的看法。但總體上他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所持有的觀點態度依然是輕蔑鄙視的。他認為，中國的政府機構建築在錯誤的原則之上，專制無能，對社會的停滯束手無策；對於中國人民，他認為他們虛偽狡詐、不知感恩且道德敗壞，隸屬於一個低下的社會。在衛三畏看來，唯一能拯救中國的方法就是全面轉向基督教義。^③

杜赫德和衛三畏的著作中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前者對中國不吝讚美之詞，而後者卻對之蔑視不屑。當然，我們知道在杜赫德的作品完成之後，中國的形勢急轉直下，但這並不是這種差異存在的唯一原因，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及其所處時代的改變。18 世紀，許多西方人仍然樂於向他人學習，而到了 19 世紀，帝國主義的崛起決定了西方文明唯己獨尊的觀點，並認為在眾多宗教中唯有基督教是正確的。這種自大之心使得西方人認為，將自己的文明強加於他族不僅僅是他們的權利而且是他們的義務。西方對於統治地位的渴求和將中國納入西方實踐、體制和價值觀

的意願必然導致了中國形象的負面轉化。

就如同其他時期一樣，在 19 世紀，我們依然可以找到相反的中國形象。偉大的法國詩人、小說家、劇作家雨果（1802—1885）對於中國圓明園的溢美之詞，以及在這座宮殿於 1860 年毀於英法聯軍之手以後的討伐檄文都是廣為人知的。這一時期，一些傳教士也完成了關於中國的卓著工作。例如，蘇格蘭傳教士、學者理雅各（1815—1897）將中國經典古籍文本翻譯成了英文。儘管在今天他的卷本已被後人超越，但仍具有極高的價值。^④

但是，由於政治及其他方面的原因，19 世紀的最後幾年可謂是中國西方形象史上的一個谷底。1895 年直立人化石在爪哇島上出土並被命名為爪哇猿人。這一發現鞏固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在西方的地位，其影響之一就在於加強了西方觀念中對種族差異的認知。社會達爾文主義似乎肯定了文明等級的存在，而在這個等級制度中，西方文明處於頂端而非洲文明處於底部。儘管東亞相較於其他文明來說略勝一籌但卻遠遜於西方文明。19 世紀最後的一個 10 年見證了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中國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書的出版。這本書影響廣泛，至 1900 年已五次再版，且被譯為多種語言。它不僅影響了西方社會，甚至掀起了中國民族主義者對中國國民性的反思思潮。明恩溥歸納了一系列“中國人的性格特徵”，其中有褒有貶。一方面作者認同中國人的孝悌仁義、內斂含蓄，但更多的則是批判中國人民智未開、缺乏公心。他認為中國人“神經麻木”，因此相較於西方人能忍善耐，但卻冷漠殘酷、缺乏同情心。